

神學不能失系列七：教會脫逼迫「未脫世界」更大考驗

徐濟時

引言：使徒保羅忠告羅馬首都教會「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羅十二 2)，隨即教會面對世界先受逼迫及後脫逼迫，這兩段時期對保羅這「忠言」竟是先順耳後「逆耳」、出乎意料大不同，原來「不效法世界」蘊含大學問大考驗，在世俗中後逼迫期教會的「成敗史」，就成大鏡子。近現代學術顯證，做學問做得好，至少要從歷史處境(包括從考古學)察識歷代有影響力人物的言說、做到鑑古知今；然而，華人教會界不好讀史，神學教育至今仍處於啃讀西方名師大作(翻譯本僅做到推廣)的初階，少顧及原作者的歷史處境而陷於「史盲」¹地讀，怎能鑑古知今(古讀今用)？當然，我們仍少做到一手研究而多是「二手研究」(但不必自咎)，這是必然的起步，但起步到進步，靠多行一步。所以此系列試行此步：選取西方學界公認具影響力而仍未被華人教會充分關注的史作(前文有最早期教會「一批遺作」和優西比烏「第一本教會史」)，盼能填補大歷史一些空白區。以下從歷史處境反思教會脫離逼迫後應對「世界」之考驗，並且補研第四世紀起長達幾百年一段「教會史空窗期」。本人意見會以不同字體識別。

一，首次教會大公會議「效法世界」濫觴

耶魯大學一代教會史學者 Williston Walker(1860-1922)² 對後逼迫的基督教「正常化」，辨識出一些備受忽略的非宗教因素；他認為羅馬新上位的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306-337 在位)，以吸納基督教為至關重要的政治考量，因「單一宗教」能促成其分裂帝國邁向合一(completion of the process of unification)：體現為一位君王、一套法律、歸一國籍(one citizenship for all free men)³。為此，他自 319 年起頒下一系列法令優待基督教，如神職人員豁免交稅、教牧受禮展新風、教會擁特權受贈遺產、主日休息禁工作、異教禁私人祭禮、舉國大教堂獲國庫興建等。君王連番「恩待」，一方面有利基督教「上位」成國教，⁴ 另一方面誘陷基督教世俗化(事後才發現弊端)。

¹ 就算是我方傳統「孔孟之道」，也是孔子孟子身處相隔百多年的春秋與戰國大不同時期，二人所言各有歷史處境，不宜「混為一談」，這是儒學研究也要治史的大方向。

² 本文前部份參引 Williston Walker,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1) p.112-128 (另見「文藝」1990 年第六版中譯本的第三期第一段至第三段)。Walker 此經典教科書，至今仍為神學院樂用。以下的撮引，由本人譯撰，為行文流暢，會減少原頁碼之標示。

³ *Ibid.* p.112.

⁴ 他的 330 年遷都(從羅馬遷君士坦丁堡)反使羅馬主教在說拉丁語之帝國西部權勢大增，他所重視的，是納「大公」教會入建制系統(hierarchically organized portion that called itself the "Catholic" *Ibid.* p.113)於其統管，有利長治久安。

當時，各地以至首都的教會圈，常現信仰上對抗不和，⁵ 不利君士坦丁統一全國；他於 314 年起，遂制定國策、動用國庫以召開宗教會議，欲在國家管促下(under imperial control) 化解地區教會彼此紛爭。在這背景下，他召開第一次全國性的尼西亞會議（325 年），欲解決一籃子教內問題，包括從埃及神學重鎮亞歷山大擴散全國的亞流主義(Arianism) 那關乎「基督是受造次等神」的教義爭論。⁶

這貴為首次大公會議，赴會的主教約 300，但羅馬為首的西部教會僅 6 人出席，而東部教會佔上絕大多數〔按：尼西亞位處帝國東部〕。會中有以下三派神學立場及其代表人物：反亞流(Arius)的亞歷山大主教亞歷山大(Alexander)是大會中少數派，⁷ 支持亞流（原是俄利根門生）的尼哥美地亞之優西比烏(Eusebius of Nicomedia)亦是少數派，兩派是鬥爭主角；持中間立場的則是大會多數派，由該撒利亞之優西比烏(Eusebius of Caesarea) 領銜。三派實是圍繞先師俄利根(Origen,185-254) 所教導的基督論，各取所需而作爭辯。值得補充的是：昔日位居正統的俄利根，維護初期教會主流基督論的「子從屬父之下」(次位論/subordinationism)，今日來看也趨近異端，對此現今福音派大多只取基督是功能上(economic/functional)次位、非本體上(ontological) 次位，嘗試或勉強解決其中難題。

初信主的君士坦丁，還未受洗更非教友，卻出席大會並中坐王座上，憑其顯赫地位為爭拗的主教和神學家，帶動出決定性的影響。會中，該撒利亞之優西比烏提出其帶領的教會所持早於爭拗的信經(creed)。「大會認同和修訂優氏此一信經，強化其中的父子同等位份，如子是「受生非受造、與父同質」，反對亞流的說法。修訂的內容，是君士坦丁贊成的，也是西部（拉丁）教會認同的，因為「同質」這爭議的希臘文 *homo-ousion*〔按：英譯多是 same - essence〕，向來在拉丁文的譯詞被視為正宗(orthodox)，也是第二世紀起的哲學上詞彙。」⁸

Walker 指稱，君士坦丁作為一位政治家最大心願，是有一條神學公式(formula)能得到帝國西部半數人(the Western half of the empire)不反對，和得到國土東部部分人支持(a portion of the East)，好過令西部全反對這般不利他統一全國大計。遂在君王影響下，尼西亞的定義就被拍板，成為舉國認定信經。⁹ 赴會主教除了兩位，皆簽名同意此議決。事後此二人與亞流，皆被

⁵ 各有複雜原因，一言難盡。但在第一代使徒如約翰及其後眾主教，對「異端」之辨認和排斥，已蔚然成風；所以，教會將異己扣上異端帽子來攻擊，可大收剷除之效。中世紀「異端」與日俱增，「誰有問題」實難辨之。

⁶ "To Arius's thinking, Christ was neither fully God nor fully man, but a *tertium quid* between. This is what makes his view wholly unsatisfactory." *Ibid.* p.115.

⁷ 此派出於該城前神學大師俄利根的思想，此派稱「子永遠與父同質且非受造」("the Son was eternal, like in essence to the Father, and wholly uncreated. ... its unlikeness to that of Arius is apparent." *Ibid.* p.115)。

⁸ 原文稍長，摘錄如下： "This Caesarean creed was now amended most significantly by the insertion of the expressions, "begotten, not made," "of one essence (*homoousion*, ὁμοούσιον) with the Father"; and by the specific rejection of Arian formulae ... unlike words **essence, substance (οὐσία), and hypostasis (ὑπόστασις) were here used as equivalent expressions...** the influences which secured these things were Western... supported by the Emperor. In particular, the test words, *homoousion*, had been orthodox in its Latin equivalent, and had been in philosophic usage in the second century, ..." *Ibid.* p.116。

⁹ "To Constantine's influence the adoption of the Nicene definition was due." *Ibid.* p.117。會議另一要項，就是平息東西教會對復活節計算日期的爭議。因羅馬天主教的計法，有別於東正教的計法，但至今仍是各有各計。

罰放逐。

然而，*homoousion*（子與父同質一體）的議決，尤其在東部教會，在隨後五十年仍紛爭不絕（見注解）。¹⁰ 會議後不出三年，藉君士坦丁之妹 Constantia 襄助，支持亞流的尼哥美地亞之優西比烏，竟得寵回朝（至 337 年君士坦丁臨終更由他施洗），他更召回亞流再推其說，並使君士坦丁接納亞流修訂之說，後更成為強勢。之後，亞他那修(296-373)雖然接上阿歷山大作了亞歷山太主教，卻「四面受敵」：他擁護尼西亞信經、力挽狂瀾而不果，反而淪到他被「政教結合的勢力」五度逐出阿歷山太，而尼西亞信經亦在繼後的君王漸失影響至幾乎廢棄，直到小亞細亞的神學傳統與北非亞歷山太俄利根的後人——部份衍生「半亞流派」(Semi-Arians)——聯合再壯大，才孕育助長出新尼西亞神學(New-Nicene theology)，要延後逾半世紀至 381 年第二次大公會議，才得以堅立，使這一神學爭拗暫時落幕。¹¹

此外，二百多年逼迫期所積壓的教會內和教義上紛爭，自君士坦丁掌管全國，才頻頻召開大會予以解決，但形成王權滲入教會事務之「風尚」。當東部和西部教會陷入不和，教會求助於政治仍苦無出路、對抗互鬥，以致長期不能合一，終走上數百年後大分裂之路(the Schism of 1054)。此等歷史教訓，之後仍屢見不鮮。

本人認為，從以上歷史片段，可窺見歷代教會的神學／教義之發展，不斷重複著這種「對立下分分合合」的窘局。這現象實與神學孕育源出多方，有莫大關係：希臘語系的傾向本體論形而

¹⁰ 這紛爭涉及帝國東部屬敘利亞亞蘭文化的安提阿學派，與屬柏拉圖、希臘思想的亞歷山太學派彼此之爭，實還有此兩派和帝國西部（包括部份北非）操拉丁語的「羅馬學派」之爭。三方對「質／體／性」等概念和翻譯皆現鴻溝，例如希臘文 οὐσία (*ousia* /substance=質) 與 ὑπόστασις (*hypostasis*=性)，譯成拉丁文實無合用字而要「勉強譯」，這方面反映彼此存在思維有別、難以溝通，近代興起的語言學對此才加以細研，不贅。本人發現：中文著作中有相關解說的不少，可參朱心然著《安身與立命：東方教會在華宣教史》（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09 年）56-59, 67-72 頁。再者，這基督耶穌是「神人二性、與父同質」(hypostatic union) 的討論之外，本人認為關乎「三位一體」的中文翻譯亦應再討論，因為中文的「位」和「體」如何與原始三一教義的希臘拉丁兩文配合得宜，似缺乏學術研議下流通至今；按「三位一體」的修辭，亦通於「一位三體」的概念，可能後者更接近正統教理的原意。請參徐濟時撰〈基督教上帝的教義：中式「三位一體」表述初探〉，中華神學研究中心《研究季報》第一期 2020 年 10 月，26-28 頁。(www.ctrcentre.org)

¹¹ 359 年之後，在厭倦長期爭拗的氛圍下，「類似派」(*homoios* /子與父似) 日漸抬頭，因為大多數認為尼西亞議決是一種妥協致兩面不討好，因此不妨用 ὁμοιον (*homoion* /like) 這條 formula 減爭拗。Walker 認為亞他那修的定義，是西方神學的典範而最理想；那承接亞他那修的小亞細亞東部的加帕多家(Cappadocia)三教父作的修訂，使東方教會接納西方教會的三一觀（381 年君士坦丁堡大會的成就），但 Walker 仍視此新尼西亞神學為不理想。Walker 明顯以西方本位貶評加帕多家三教父的修訂，他引 Reinhold Seeberg 的 1905 德譯英名著，如此說：“Athanasius (and Marcellus) taught the one God, leading a threefold personal life, who reveals Himself as such. The Cappadocians think of three divine hypostases, which, as they manifest the same activity, are recognized as possessing one nature and the same dignity. The mystery for the former lay in the trinity; for the latter, in the unity. ...The Cappadocians interpreted the doctrine of Athanasiu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eptions and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the Logos-Christology of Origen. They paid, however, for their achievement a high price, the magnitude of which they did not realize — the idea of the personal God. Three personalities and an abstract, impersonal essence, are the resultant.” (*Ibid.* p.126-127, quote from Seeberg, *Text-Book of the History of Doctrines*, Eng. tr., 1:232)。Walker 隨後補上西方的（正統）三一觀：“Hence-forth there was to be but one religion in the empire, and that the Christian. Moreover, only that form of Christianity was to exist which taught one divine essence in three hypostases, or, as the West would express it in supposedly similar terms, one substance in three persons.” *Ibid.* p.127。然而，Walker 所引這些英文修辭縱然劃一，中文修辭仍未統一（或根本乏字可譯）。

上學探索（引致詮釋爭拗、各執寓意），拉丁語系的重視法律思辨下定立命題性條文式信經（利於持守正統、辨別異端），亞蘭語系的強調敘利亞希伯來文化那宗教實存體驗（取字意解經、拒抽象神學）。當彼此為神學問題雖召開大會，但難以對話，再加語言差異構成翻譯困難，且更各執一詞、各持己見，就必然處於停不了之爭拗。倘若再加上各自主動和被動引入政治力量「保駕護航」，也就必然捲入政教勾結、利益回饋等非神學性範疇；「以神學之名，行政治之實」頓成長期態勢，令教會發展變質。這可以從教會史二千年來諸多「亂史」佐證。今人研究歷史神學，往往單從（純）神學辨識、（只）教內因素入手，並不充份，宜考察有否「外力」召入滲入、左右大局（如上述首次大公會議）。

二，失傳的東方教會在「回教世界」興衰

有必要補上一筆，Walker 所論的教會史，只反映西方學者的主流關注，仍欠全圖（因為這些史料如大部分西方學者同類史書，少觸及「東方教會」(Church of the East /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這一大失落範疇，此中譯本就將身處東羅馬的「東部教會(Eastern Church)」誤譯作「東方教會」)；S. H. Moffett 名著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有中譯本《亞洲基督教史》(文藝 2000 年出版)，其第三章「敘利亞時期的東方教會」是英語界少有之作，但欠全面；莊祖鯤《宣教歷史(增修版)》(美國真光協會 2024 年版)，其第六章「東方教會宣教模式」有豐富的資料整理，卻欠出處。

以下所論東方教會，正其名為：羅馬東擴下國境外那跨出敘利亞(Syria)、身處波斯境內薩珊王朝(Sassanian Persian Empire, 224-651) 創生見證及宣教的教會。這教會原出自耶穌門徒（其主力多馬佈道隊更於 345 年到達印度南 Malabar 成立教會至今），也因羅波大國衝突備受逼迫、殉道者眾；直到 410 年，波斯國王 Yazdegerd I 在帝國首府召開 The Council of Seleucia-Ctesiphon，「寬容」並納入這東方教會為波斯國境內合法宗教（被政權定性 dhimmi 即「受伊斯蘭保護一神異教」免受逼迫但奉國教者禁入此教），仿如一世紀前君士坦丁在羅馬帝國對教會所作。東方教會在上述逆境慘況和「寄人籬下」仍生發巨大見證逾千年，今人知之甚少，實是使徒行傳沒有觸及、全無暗示的「福音東傳」延續版：

廣義而言，東方教會傳承尼西亞信經、忠奉羅馬的主教（統領）模式，名義上是東羅馬國境外基督教一宗派，屬於「純正信仰」。狹義而言，東方教會則出現不少神學上「是非」如下：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敘利亞人 Nestorian（涅斯多留或聶斯托理，381-451），反對西方教會主張的馬利亞是「神之母(Theotokos = Mother of God)」和另釋基督論的「神人二性」，被 431 年

以弗所大公會議判為「異端」(參註解)¹²，逐出國土至敘利亞東部那全城奉基督之伊得撒 (Edessa of Osrhoene)，其跟隨者再遠走波斯首都正式歸入東方教會而賴以壯大，甚至日後東方教會亦被稱為涅斯多留派(Nestorians)。另一發展，Edessa Jacobus Baradaeus，於 540 年往君士坦丁堡，請求平反基督一性說 (Monophysitism，被 451 年迦克墩大公會議判其「神性蓋過人性說」撥入「異端」)，但他遭罰入獄後回伊得撒被尊為主教；此修士興起西敘(West Syrian)教會形成雅各派(Jacobites)，與東敘 (East Syrian，擴大成現今兩伊地域) 教會的涅斯多留派也常被合稱。這曲折的一段歷史涉及敏感的「語言角力」(誰掌話語權) 下，往往被西方神學界自詡「純正為名」，蓋過歷史所透顯的「實情」，請參註解。¹³

今天歷史神學家多認為，涅斯多留派和雅各派，實與「主流派」的基督論教義大同小異，應免受異端之罪罰；再者，此兩派承續最初安提阿基督徒(徒十一 26)以敘利亞文即亞蘭文思考的神學(同於耶路撒冷教會)，自被逐仍宣教興教長達千年，其神學有別兩千年強勢至今西方教會所傾向的希羅化神學。這就帶來一連串問題，如：究竟基督信仰的「真傳」應是東方教會或西方教會？東西方神學所出「教義」是解釋真理或是等同真理？歷代教會是要守護正統或是可修訂正統？中華吾輩宜對這些問題深思究察。

有必要一提，盛行敘利亞語文的東方教會有一位劃時代亞述人後裔 Timothy I 主教/教長(780-823 在任)，他處身於兩河流域的前巴比倫城的首府 Seleucia-Ctesiphon (時為世界商貿中心，現今伊拉克巴格達) 並受制於擊敗波斯的強悍回教勢力下，竟能帶動教會滿有「本領」¹⁴，應對高壓不靖的社會變遷，使十九大都會(metropolitans) 85 位主教堅守「使徒原出教義」(此稱因語

¹² 這是不正確的「異端」判斷，不幸為基督新教延續。天主教會後至 1994 年，才與「東方教會」簽定有關基督論的共同聲明而使之邁向「平反」，2018 年教宗方濟各與其宗主教 Mar Gewargis III 再簽聯合聲明，進一步修好至今。

¹³ 西歐大陸的文化思想源自拉丁語文，但地中海東部因跌宕的歷史造成此狀：社會雖以希臘語文主導，教會仍持守傳統的「敘利亞—亞蘭語文」(埃及則持守其傳統的科普替(Coptic)語文)。西敘親波斯的伊得撒(今 Urfa)，其典故有亞伯拉罕往迦南經此、耶穌回信其求醫的王、多馬(門生加利利人 Thaddaeus/Addai 乃東方教會之父) 骨灰從印度遷此城等，有傳是早於亞美尼亞的第一個基督教城邦國(於 200 年，另傳東外四百哩的 Arbela of Adiabene 更早歸主)。無論誰是最早，敘利亞語文隨即領導「羅馬國境外教會」的教務和神學，且漸不受羅馬境內教會的禮儀和拉丁文、希臘文著作所影響，敘利亞文聖經 Peshitta 流通東方(遠至宣教區中國印度)如武加大譯本通行西方。(見注 16 所示 Jenkins 書，在此先引 "The easterners traced their origins to Edessa, which pioneered Christian scholarship and was the birthplace of Syriac Christian writing. Syriac grew in use as Eastern churches became more disaffected with the Orthodox churches and the imperial regime, and Nestorians and Monophysites naturally developed Syriac liturgies." p.77) 到第六世紀，該地區 Nisibis (現今 Nusaybin) 成為敘利亞神學中心，設有如同大學的希臘思想研究和收留來自拜占庭的異見者，名聲遠播至拉丁學界；敘利亞神學家乃富有實力、長達一千年(1100 年後一度中興)，及得上西方的希臘、拉丁同輩，影響更廣至塑造伊斯蘭的科學和哲學。雅各派教會更盛產人才如下：與西方耶柔米齊名的解經家兼史學家 Jacob of Edessa (640-708)、十字軍東征路徑根據的敘利亞文世界史(圖)作者安提阿人 Michael the Syrian(1126-1199)、比得上同代亞奎那且被尊稱「13 世紀百科全書」居於米所波大米 Mosul 的猶太裔主教 Gregory Bar-Hebraeus (1226-1286)，不贅。(詳參注 16 的 Jenkins 書 77-81 頁)

¹⁴ 穆斯林政權初期寬待基督教至少上百年，學者分析原因之一是這些源自羅馬帝國的基督教徒，人才輩出、見識廣博、政教兼善，正如 Timothy I 著作等身、護教出色、翻譯亞里斯多德作品給朝野等成就。史家 John P. Jenkins 稱基督徒在米所波大米(Mesopotamia/Iraq)依據猶太經典 Talmud 育成豐盛的基督教文化(於 9-13 世紀甚至超越歐洲的基督教文化)，這盛勢亦間接提升回教阿拉伯人道德見識、治國理政，貢獻良多的教會因而免受逼迫，就如才幹出眾的「但以理及三友」服務昔日巴比倫幾代王朝，備受重用。

源思維一致)、力推境內境外宣教至為興旺：東傳至遙遠中國西安¹⁵ 並增建教區至北京和西藏（其傳教士與儒道佛打齊交道尤如後來的利瑪竇），南傳至印度再擴教區東臨恒河文明地（前已達斯里蘭卡、盛傳後入印尼），北傳至貝加爾湖使突厥王 **Kerait Turks** 於 1000 年領 20 萬臣民奉教達四百年。¹⁶ 不少史家甚至稱 Timothy I 的東方教會，比西方（希羅）教會更能直承舊約以色列(Semitic Christianity)，其興旺期長達 9 至 13 世紀，論地域之廣和信眾之多，皆超過當年未分裂出新教的整個西方（歐洲）教會，顯為基督宗教全球最大的「宗派」，在 Timothy I 那盛世之時西方世界僅是法王 Charlemagne(768-814 在任)的政教結合初階而已。

東方教會如斯重要，西方學者過去半世紀，才再發現東方教會有不少比「異端」舊調更為真實、更多未為人知的狀況（尤其第四世紀後），教會史學／歷史神學或將掀起中東、中亞至東亞神學發展「向東走」的新質研究。

遺憾的是，歷史往往好景不常，東方教會連同新約奠基的小亞細亞(Asia Minor)「衰敗」之迅速，皆令人驚訝。學者爬耕史料發現，十一世紀之後教會是如此變遷：使徒創立至 1050 年仍蓬勃、遍佈小亞細亞之教會，此際屬於正教會(Orthodox Church)，由區內 373 位主教領導；但四百年後，主教僅餘 3 位，基督徒大跌至該區人口僅百分之 10 或 15。¹⁷ 1200-1500 三百年間，基督徒人數從 21,000,000 跌至 3,400,000；亞洲（中東地區為主）非洲合計的基督徒佔總人口，從百分之 34 大跌至百分之 6，可謂好景不常。

至於源自涅斯多留一度「偉大成功」的東方教會，在今天其「大本營」只能瑟縮芝加哥稱為 the Holy Apostolic Catholic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遙念其根源地；因伊拉克北上接壤亞美尼亞之東方教會「祖居地」遭近千年非基督化，到 1920 年代僅存四萬信徒且為難民，1933 再遭穆斯林殘殺以致波蘭猶裔律師 Raphael Lemkin 1943 年造出(coin)新詞 genocide（種族滅絕）形

¹⁵ 見於 781 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學術界稱之為 Nestorian Stones，可見華夏首聞之福音來自東方教會（教長阿羅本或譯自 rabban 即主教於 635 年來華）。該碑文已廣受各方華人學者研探，是早期基督教義迎向佛道挑戰進行本色化之範本，不贅。

¹⁶ 詳參被稱為 ground breaking work 的 John Philip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Thousand-Year Golden Age of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Asia--and How It Died*(New York: HarperOne, 2009) p. 5-18, 69, 184-86。其中有精彩的文明交流描繪，直引如下：“It was Christians—Nestorian, Jacobite, Orthodox, and others—who preserved and translated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the ancient world—the science, philosophy, and medicine—and who transmitted it to centers like Baghdad and Damascus.....Syriac-speaking Christian scholars brought the works of Aristotle to the Muslim world: Timothy himself translated Aristotle’s Topics from Syriac into Arabic.....Syriac Christians even make the first reference to the efficient Indian numbering system that we know today as “Arabic,” and long before this technique gained currency among Muslim thinkers.” (p.18)

¹⁷ 此外，可對比近代基督徒人口統計：1900 年小亞細亞仍維持百分之 15 或 20，1911 年君士坦丁堡仍佔百分之 50（其中希臘信徒和亞美尼亞信徒各有百分之 17），1911 年基督徒在士每拿（今 Izmir）成主流、在大敘利亞有三成。（同上 Jenkins 書，152 頁）Jenkins 估計今天基督徒在君士坦丁堡或僅有 4000、Edessa（今 Urfa）甚至沒有。（同上，161-163 頁）Jenkins 未提供近一百年上述各地統計，或經兩次大戰後有大變化，例如 1915 年起區內的亞美尼亞基督徒近 100 萬被殺（或佔人口一半），連亞述基督徒和馬龍教派(Maronites) 更多達 150 萬被殺。

容其恐怖性，希特勒隨後效法此策¹⁸ 於二戰殘待猶太人。中東從埃及、土耳其至亞拉伯、伊朗，全地到 1900 年只餘約 500 萬基督徒，佔全球基督徒不足百分之 1。¹⁹

.....

從近三十年羅馬天主教與東方教會逐步修好（參注 12），可見早期被逐出國土的教會領袖，並非如昔日屬靈的構想和論斷為「信仰不純正」而遭淘汰；若從屬靈生命看，這些領袖（大多被指為異端者）的靈性道德，絕不下於西方教會和後來分裂出的東正教會所「封聖」的偉人。

Jenkins 提出從歷史現象的觀察得出最直接方便的解釋，就是**東方教會是遭屬世政權（主要是政教結合的回教勢力）所摧毀、並非來自神學不正或靈性軟弱的問題**。這可能是過於簡化的解釋，但無奈是基督教的學術研究，一向大有興致於教會的成功，少有關注到教會的失敗 (dechristianization)；對此有一個解釋是，因回教橫掃教會之徹底至任何遺物都無存(*they do not die, must be killed*)，²⁰ 所以，這不能像歐洲一些沒落教會仍然生存上足夠的時間，能讓學者藉不少遺址遺物作研究。²¹ 本人認為據注 20 和 21 這解釋，不易驗證，原因複雜，宜留待跨科的考古學家和社會學家回答。

細看這一段歷史的其他因素，可知回教在其勢力範圍下使基督徒皈依，也不是全靠武統或打壓 (outright persecution or systematic discrimination)。因 10 世紀後，很多改信回教者是受吸引於一批回教聖徒，後者的宗教魅力(charismatic power)使改信者憶念最早期的基督教聖徒。再者，回教政權亦善用移民政策，大量移民遷入原基督徒地區、超過本土原居民人口，如此可使中東大片地區的文化語言邁入阿拉伯化，打下根基讓這冒起的回教徒，經過三至四個世紀的和平演變（換代），成為了大多數。情況的進一步變化是從 1300 年開始，中亞的帖木兒帝國(Timurid

¹⁸ 同上，140 頁。1939 年希特勒稱 “Who, after all, speaks to-day of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Armenians?” (p.140)

¹⁹ 同上，23-24 頁。換言之，1900 年中東地區基督徒仍有百分之 10，但到了世紀末大減七成至只有百分之 3，對比穆斯林同期則從 4400 萬，大增七倍至 3 億。（同上，168 頁）

²⁰ 例如：第六世紀的北非教會，強大至有 500 主教統領這區域，到了第八世紀幾乎一個主教都沒有；北非的埃及科普特教會(Coptic Church) 是倖存者，雖自 640 年遭回教統治，到 12 世紀仍維持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督徒，達人口百分之十，直至今日。（同上，34 頁）Jenkins 從比較兩者本身作評價：“Egyptian Christianity became native; its African counterpart was colonial.”（同上，35 頁）事實上，回教世界各期各族的軍閥將領，在侵佔原基督教地區長達七百年的宗教政策，時硬時軟、分區而治和善於分化，後期土耳其族摧殘新約地區正教會激起十字東征介入、更致亂局頻現（如前來援救的羅馬天主教徒比回教徒更惹人厭），實難以一概而論。1435 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Turkish Empire) 奪取羅馬帝國僅餘的君士坦丁堡，波斯以西的希臘-亞美尼亞文明被鄂圖曼全吞，回教終稱霸「大東中」並伸延至東南歐洲達今天人口四分一強。（同上，101-119, 138, 144, 150 頁詳，以 116 頁一段史為例：(1057) The Turks “began to massacre (in Melitene) without pity”... Asia Minor, which probably had 12 million people in the early Byzantine period, had barely half that by the thirteenth century ... (1140s) the Turks took Edessa the Blessed, killing or enslaving virtually its entire population, then estimated at forty-seven thousand.)

²¹ Jenkins 同步指出另一例，就是一度迅速壯大的日本教會遭遇政權封殺而倒下，此事廣為人知是有賴當時經馬尼拉、澳門抵日本的歐洲教士，深入詳載日本教會的苦難。但這批教士過後，再無有志之士接手記錄餘下成千上萬日本基督徒的命運（部份出走漁村小島成為隱蔽信徒 *kakure kirishitan*），但今人驚見四百多年後這些「餘民」，仍能唱頌 16 世紀耶穌會教士傳授的拉丁、葡語之禱文（如聖母頌名句 “*Ame Maria karassa binno domisu terikobintsu*” p.36）。（同上，29-30 頁）

Dynasty)繼前突厥悍民(Seljuk Turks)，入侵再屠殺，使弱勢的基督教會終遭致命一擊。²²

Jenkins 指出一（歷史可印證）理論，就是「教會結構」也扮演重要角色：高度中央化階級性的建制教會，比之分散為群體自理(decentralized)的平民教會，反會不堪一擊被摧毀。埃及科普替教會，正是賴其全民性能生存下來。²³ 並且，遭逼迫而分散的教會，往往在散居地創出新一代教會，正如使徒行傳第八章、逼迫下耶路撒冷教會出走而開枝散葉。

雖然回教世界難以見到昔日蓬勃的基督教遺跡，但學者們指出，大批清真寺乃模仿東正教堂且多是建在摧毀的教堂原址（或保留原教堂一部份改建成清真寺）²⁴，不少可蘭經文是仿效羅馬帝國東部教會所用的靈修、詩歌、禱文和禮拜文等，甚至西方教會陌生的回教徒「頂禮膜拜」實來自早期東部教會。十三世紀起佔領小亞細亞的穆斯林土耳其人(Turks)，用基督徒婦女為婢女卻帶給孩子影響，住偏遠地區的直到十九世紀仍仿效基督教邀教牧為小孩安康施洗。以上可見，伊斯蘭教與那時代東方（中東）地域教會，原來彼此是「十分親密」(so intimate)。²⁵

被尊為最後一位教父大馬色約翰(John Damascene)於 8 世紀初已稱，伊斯蘭教實是基督教一異端(heresy)，假先知 Mohammed〔按：Muhammad〕將新舊約聖經結合其歸依的亞流主義，再創出其異端。²⁶ 為穆罕默德作傳記的 Ibn Ishaq 稱他童年訪敘利亞時，蒙教會修士 Bahira 視為天才、認定他為四福音所預言的先知。然而，中世紀基督徒則普遍視他為教內分裂者

²² 同上，30-33 頁。阿拉伯世界中能保住基督教至少至 10 世紀的，僅餘“Lakhmid state based in al-Hirah, in Mesopotamia; and the Syrian Ghassanids... Bostra (southern Syria)”和 4 世紀已為 Nestorian center 的波斯灣島國巴林等。（188 頁）

²³ 同上，35, 205 頁。

²⁴ 清真寺樣式仿冒 6-7 世紀東羅馬拜占庭時期教堂，代表作是至今仍在的伊斯坦堡 Hagia Sophia（532 年原建）和耶路撒冷 Dome of the Rock（685 年建以顯「勢頭」）。（同上，192, 216 頁）同樣，歐洲大部份教堂／聖地是建築在其摧毀的異教廟宇、神社之上，宣示「得勝」和增強百姓「效忠」(attempt to win over the loyalty of a newly Christianized population)。（173 頁）但本土舊教往往轉為「未死的」民間宗教、鬼怪和神話(The old religions devolve into folklore; their gods become demons or fairies)。（174 頁）這種「較力勝出」能吸引百姓皈依，似至今仍被推崇，如一學者說：“the common acceptance by Muslim and Christian alike of the error that the favor of God is shown by worldly success.” Laurence E. Browne, *The Eclipse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from the time of Muhammad till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3, p.184.

²⁵ 同上，37-38 頁（詳見 194-196 頁，其中妙論是「禁食守齋」：“It is not always easy to tell whether Muslims were influenced by practices they witnessed in Ethiopia or the eastern Syriac world, because the two were so closely related, but somewhere they observed the Christian practice of fasting, which shaped the Islamic custom of Ramadan. ... this was in fact close to the oldest Christian practice of Lent. ... Muslims strove to present their faith as the true successor to older Christianity.”）從中可見，今天中東屬本土（原住民）的回教徒乃是千百年前基督徒的「變種後人」，信仰和文化的「麥籽」雖然死了但未死透（埃塞俄比亞基督教一直沒有回教化正好有「原版對照」供比較研究）。這「根」另見證於日本和中國：日本自 1650 年殺趕最後一位教士後，鎖國二百多年，但 1865 年天主教教士重臨竟遇上 15 位屬地下信徒的老農民前來求道；中國在 10 和 14 世紀兩度「殺教」，而 1300 年間馬可孛羅遊華發現七百年前入華景教未死，奉教後人仍在。（175-177 頁）

²⁶ John of Damascus, *Writings*, vol. 37 of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 of America Press, 1958), p.153-160.

(schismatic)而非異教領袖。²⁷ 此外，他的亞拉伯文可蘭經，被指不單抄引聖經主要人物和論述，更挪用東方教會流行一批次經的內容，且可能其底本是當時中東國家共用的敘利亞文（亞蘭文）；此等研究近年在西方興起而對回教或具冒犯性，在此僅將 Jenkins 書的重點放註腳供參詳。²⁸ 簡言之，回基兩教之關係研究，連同東方教會的不斷「被再發現」，或能促進宗教研究界作出突破性貢獻。

綜合而言，中東地區的原基督教會，歷經佔領全境的「回教洗禮」，直至 1900 年的統計，存留下來的基督徒人口，仍有百分之 10；²⁹ 餘種仍存，前路艱難。本人認為這一個大歷史，含有不少教訓供我們反省。具切身性和警惕性的是，同類大歷史已重現於歐洲，因為今天歐洲大部分建制教會的「餘種」只有宏偉的教堂（但連維修費也非來自會友），前來崇拜的會眾或坐不到百分之 10 座位。歐洲教會在悠久的西方教會行列中，率先被世俗（化）在和平演變下摧毀，猶如昔日東方教會在入侵武力（加其他因素）下摧毀。這一歷史循環，帶出的歷史教訓若不為今天教會警覺，那麼，下一輪被摧毀的將是領導世界風潮北美大國那正在江河日下的教會，甚至包括一度興旺已然老化的北美華人教會（多靠移民潮支撐一會，就如今天英國華人教會受惠於香港移民潮那佔四成的大量基督徒）；再後一輪倒下的，更可以是蓬勃的韓國教會和中國教會（香港教會近十年正在萎縮），同陷此一具循環性世俗化危機（「殺傷力」比武力更大），正如：本世紀「韓流」使大韓奔富下教會擋不了世界而節節敗退，具韌性的中國家庭教會也敵不了舉國富強下世俗誘惑。保羅勉勵帝國都會的教會這句話「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羅十二 2），是何等具「歷史驗證性」的警世之言！³⁰

三，宣教的東方教會不失「改變世界」見證

²⁷ John Victor Tolan, *Sarace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2002). Patricia Crone and Michael Cook, *Hagarism: The Making of the Islamic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Jenkins 書，185 頁。

²⁸ "The Quran tells many familiar biblical stories, featuring Abraham, Moses, ... Jesus and Mary, and of course the Quranic focus on the Last Judgment strongly recalls biblical texts. ...from Eastern forms of Christianity. Most of the Quranic stories about Mary and Jesus find their parallels not in the canonical four Gospels but in apocryphal texts that circulated widely in the East, such as the Protevangelium of James and the Arabic Infancy Gospel. The Quran cites the miracle in which the infant Jesus shaped a bird out of clay and then breathed life into it, a tale also found in the Infancy Gospel of Thomas. **The Quran also presents the death of Jesus in exactly the language of those heretical Eastern Christians known as the Docetists, who saw the event as an illusion rather than a concrete reality...**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scholars have questioned whether the Quran could even have originated in Arabia, or whether it was collected or constructed somewhere else ...German scholar **Christoph Luxenberg suggests that the Quran is a confused translation from earlier Syriac Christian texts, at a time when Syriac was the lingua franca [bridge language like English today] of the Middle East.** ... there is no doubt that Eastern Christians were a well-known presence in the Arabian world, and influence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Islam." (p. 186-187)

²⁹ 同上，42 頁。

³⁰ 然而，歷史顯證「宗教信仰韌性」或會轉弱但不會滅亡，如當代高度世俗化的歐洲被 Jenkins 描述成生機仍在、復興有望：“at least a minority will try to return to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religion as they understand it, so that we see an upsurge of evangelical and charismatic groups and other neotraditional movements.”(p.208)。

東方教會值得華人特別關注的，就是因為福音首次來華（唐朝）始於 635 年，時稱景教。傳教人員極可能是來自波斯東陲接近中印兩大文明的大城 Merv〔按：或譯 Merw，蒙古 1221 年毀之成廢墟、1236 年滅其北鄰基督教強國格魯吉亞〕，此城長達數世紀貴為廣義的基督宗教其中一個世界中心，它早於 500 年已出現希臘文、敘利亞文典籍譯成中亞和東亞的文字（6 至 13 世紀擁有比得上任何歐洲宗教中心的屬靈資源），能大助向外宣教。³¹ 基於此，東傳至中華文明之景教得成，但僅至第九世紀中業；主因是其建教過程未有達成本地化，這從第八世紀末碑文所刻名字全是外來敘利亞人可見。再加上，國策對來華宗教有變，當時佛教已遭拒，景教也不例外。

景教貴為中國教會第一粒種籽，吾輩理當慎終追遠加以研究，好使「教」德歸厚。可惜，這教會對於西方教會及西化的中港台教會，素來陌生，但其源出敘利亞和埃及的亞歷山太豐富神學傳統，頗能與儒道思想融攝貫通，應有大效於植根中華文化，極待重新開發；例如，從亞歷山太主教／教父亞他那修(296-373) 所傳揚“God became man so that men might become gods”，可窺知他此說與中華文明核心之道「天人合一」，存在不少互攝相融。³²

然而，元朝(1271-1368)那來自蒙古的宮廷，容讓基督教（也里可溫教）和佛教再來，亦賴於已蓬勃幾百年「絲綢之路」、商人絡繹不斷之勢再推傳教士東來，而天主教士也不甘後人於晚元來華。三大外教來華之盛景，一時無兩。然而，**外來宗教與中國朝廷打交道，往往是好景不常，主因不外是「文化差異」使關係惡化至彼此衝突，這情況於歷史不斷重複，亦不幸被捲入本世紀地緣政治。**³³

值得一提，東方教會（涅斯多留派）在印度的發展，頗為暢順。³⁴ 盛傳第二世紀或前，使徒多馬佈道隊已到達印度南面開展福音工作。約 425 年，印度已見希臘文本羅馬書被譯成敘利亞文本；在 550 年，Cosmas〔按：稱 Cosmas the Monk，旅印多次的作家〕第一身報道說到 Calliana 有從波斯委任的主教、斯里蘭卡已存在教會。Mylapore（今印度西南角 Kerala 州）沿岸眾教會，奉行敘利亞禮儀至中世紀。多馬建立的印度教會，一直少遇上殉道逼迫，至 1500 年那裡有三萬個家庭享居平安。此外，1503 年傳出有三位主教被按立差往印度、印度洋島嶼如爪哇（今印尼主島），以至遠至中國。³⁵

中世紀的宣教特色是，所有宣教士遵奉同一宣教策略：使君王和統治階層歸主，從而使其全體國民信主，成就國教模式。東方教會確能使蒙古王族於 13 世紀一一歸主，但未能進一步建成

³¹ 同上，45-46 頁。

³² 同上，75 頁。

³³ 地緣政治對於普遍「不理現世只待來世」的福音派基督徒，更易被政客以宗教名義所操控，尤其西方教會全情支持錫安主義(Christian Zionism) 致使亞拉伯（如巴勒斯坦）基督徒也被遺忘。（同上，167 頁）

³⁴ Jenkins 名著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有詳盡的資料蒐集和整理，有力駁倒「基督教早入印度不實」之說，續引為據。

³⁵ 同上，66-67 頁。

基督教國家，否則中亞和中東的「宗教版圖」可能大別於今。然而，有些方面漸次在學術界得出共識，就是宗教若能深入基層群眾本土語言（尤其聖經翻譯），對其延續韌性起大作用，正如科普替語於埃及、敘利亞語於米所波大米，能使宗教本土化，難被摧毀。另外，世俗政權的影響力亦非常巨大，正如強悍的土耳其人、蒙古人入侵小亞細亞和米所波大米，就對教會盡行毀滅。當然，在偏遠隔絕的地區，教會遠離逼迫，亦能生存下來，不必然是「死路一條」（殉道）。³⁶

最後，我們普遍存在一個假象，以為自使徒保羅領受馬其頓異象起，千多年的「宣教見證」全屬於歐洲境內基督教；然而，西方學術界近年冒起修訂的說法，³⁷ 本文上述的亞洲（中東和中亞）和下述的非洲（北非），乃比歐洲一段時期更屬於基督教。回顧歷史，自保羅為主力開創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向歐洲進一步傳教並非我們想像中迅速：犯境的法蘭克人奪取羅馬帝國的高盧(Gaul)，後至六世紀初才全民信教，其中熱衷教務的查理曼大帝要到第八世紀末才統治日耳曼中部的薩克遜人(Saxons)；北面的央格魯-薩克遜人，歸主亦遲至第七世紀。雖然歐洲皇室中人、政治精英頻頻信教，但各地平民百姓將民間宗教(paganism)全然離棄，仍是漫漫長路。所以，整個歐洲實有大量人口未福音化(unevangelized)。再者，斯拉夫人和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人緩緩改奉基督教，拖上二百多年；基輔（俄）羅斯帝國 987 年作出政治決定才信納（東）正教，淘汰也被其列於「入圍的」伊斯蘭教和猶太教；波羅的海強國立陶宛，更要待至 1380 年間才接受基督宗教。

對比之下，少為人知的非洲尤如亞洲，信奉基督之現象反而比歐洲顯得「強勢」（下述因篇幅所限不少放入注）。³⁸ 北非自第一世紀長達 600 年擁有興旺的基督教會，其中顯赫領袖如特土

³⁶ 同上，236-237 頁。

³⁷ 同上，69-70 頁，其中提及幾本佳作：David B. Barrett, *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796. Muldoon, *Varieties of Religious Conversion*; Richard Fletcher, *The Barbarian Conversion*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Martin Carver, ed., *The Cross Goes North* (York, England: York Medieval Press, 2004).

³⁸ Jenkins 進一步澄清並指出，宗教在東西文明各受本身「底線思維」很大影響：西方文化普遍假設各個宗教是彼此全然排斥的意念和實踐(mutually exclusive packages of ideas and practices)，悔改歸信乃是宗教生活的全面轉化(wholesale transformation)，所以不容同時是基督徒和回教徒。亞洲的情況有別，個人往往可以自由選擇宗教信仰、同時信奉佛教道教儒教。（同上，197 頁）這是對「純正信仰」的不同理解和取態。此外，還有「宗教修行」層次，宗教體驗在埃及近東一帶轉向神秘主義自最早期基督教已然盛行（Egypt and the Near East had flourishing mystical and ascetic traditions (reciting “Jesus, have mercy on me a sinner”), which reached their height in the Syriac speaking churches of late antiquity.）；這方面和後來回教在該區流行的蘇菲神秘主義（Sufi mysticism(reciting “There is no god but God” until entering ecstatic states)），密契操練（如例中之言）非常相似，以致不少學者懷疑後者（回教神秘主義）是一脈相承自東方基督教的神秘主義。（198-199 頁）其中理據是，蘇菲主義偉人 al-Hallaj 的神秘修行至令他自視為神、自稱其殉道（922 年）尤如基督甘喝苦杯。（200 頁）蘇菲派的領袖後因戰事和政治危機，很多移居至涅斯多留派原駐的敘利亞和新約教會原在的小亞細亞，形成良好關係和互相影響(shared many devotional practices and venerated the same holy men and women--- eg. Muslim Saint Charalambos, saints of the Christian pantheon, George/Khidr)（203-204 頁）；有趣的是，穆斯林不育的婦女甚至湧往敘利亞出名「靈驗」的教堂(the Virgin at Seidnaya)向聖人求得兒女。（205-206 頁）以上可見，西方貶斥為混合主義(Syncretism)的信仰狀態，東方往往大行其道，源自東方的回教也不例外，值得深思。

良、居普良、奧古斯丁³⁹ 和今人不熟悉的 *Deogratias, Eugenius, Fulgentiu, Quodvultdeus*，使北非的迦太基（而非羅馬）成為拉丁教會甚至地中海世界的宗教中心。⁴⁰ 這方面，有學者帶出有趣的神學比較：當東方希臘化教會關注的是「三一神」的融攝、基督的神人性結合等奧秘（抽象性）議題，北非拉丁化教會關注的卻是「人生活無神幫助能否完全？受異教洗歸主者需否重洗？獨身比結婚是否更高級(*higher state*)」等較少奧秘（現實性）問題，可見各因所思所好，而有不同。⁴¹ 這現象，無疑顯明「神學和教義定立取決於思維模態 (*thinking pattern*)和愛好傾向(*concerns*)」，此乃屬深層次、更本色的神學取向(*theological interests*)，即各民族「各按所思所好」⁴² 形成各色神學和各種教義；按此引申，「華人教會關注的是甚麼課題」就極之重要，是心儀西方終極關懷的(*ultimate concern*)？還是心繫我們安身立命的？如此，中華本色神學不是只有流行說法的「神學非希臘化」，還至少有二千年來（西方）神學空白區如中華文化重視的中庸、孝敬、和合、知行合一等內容，使之融入聖經教導 --- 至今此等課題仍是西方神學未關注的。這「非希臘化」和「補空白區」的做神學(*Doing Theology*)，極待華人教會深入研議並結出果子（議而有成），才能突破西方神學「定死」的思維模態和內容範圍，好使基督信仰深深植根中華文化。此乃本人認為「基督教中國化」之大道也。

自五世紀中汪達爾人從西班牙入侵北非，所向無敵但容許教會生存，至第七世紀中回教再侵北非後，百年間基督徒大舉逃亡，使教會（埃及西至大西洋大片北非教會）自趨敗亡。倖存下來至今是埃及那植根基層語言、力推鄉下修院和樂貧修士的草根性科普替教會〔按：今仍佔人口十分一〕。⁴³ 據中世紀的中段 1000 年得出如下統計：亞洲有 1700-2000 萬、非洲有 500 萬信主人口，對比歐洲（包括俄羅斯）的 4000 萬人口存在至少四分之一是異教徒或剛聞福音者、八分

³⁹ 奧古斯丁是迦太基西鄰希坡之主教，在任壓抑強大的摩尼教(*Manichaeism*)、抵制興起中極端的多納徒主義(*Donatism*)和異端的伯拉糾主義(*Pelagianism*)，保住北非教會；奧氏的神學對後世包括新教的影響，可謂無人能及，但不幸地歷代教會往往「鎖定正統」於其名下而限制了神學可容空間，例如靠近華人文化的亞米紐斯／阿民念主義(*Arminianism*)就被曲解為「變種」伯拉糾主義而備受盲目抗拒。

⁴⁰ 迦太基因靠近羅馬城早成非洲商貿重鎮且拉丁化，首世紀起受逼迫的基督徒亦紛紛避難於此，使迦太基教會興起並上位（包括首本失傳的拉丁文聖經完成於 200 年和首訂新舊約正典 66 卷大會舉行於 397 年）；因地理環境隔於埃及，它亦少受亞歷山太的希臘化神學影響。迦太基擁有拉丁世界一批優秀教父，人才輩出。以上所說見於：“Gregory I in one of his letters asserts that the Apostolic Succession in Africa was derived from the Roman Church ... p.23 / **no Church was more orthodox than that of Carthage.** p.2 / This superiority was also maintained on doctrinal points; in no part of the West were the clergy and people so orthodox as in Africa. p.187/ Novatianism, Donatism, Pelagianism, Manichaeism, and Arianism, obtain a footing in the Province ... (but) to withdraw in confusion. ... **The Christians of Carthage in fact formed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orthodox communions of the early church, and they did much to fix the doctrines of Christianity as we know them, and to settle the canon in its present form.** p.245/ they (African churches) were more orthodox than Rome itself ... p.246”。以上引文出自 L.R. Holme, *The Extinction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in North Afric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8)。

⁴¹ Holme 書，26 頁。

⁴² 例如西方的希羅傳統使其所思所好之一是「性」(*sex interest*)，神學討論於今廣泛至 *sexuality, sexual orientations(LGBTQ+), the right to sex, Theology of the body, Feminist Theology* 等，其中不乏「神學戰場」。

⁴³ Jenkins 書，228-231 頁；“**They fell because they were the churches of a party and not of a people; they appealed to the civilized Romans alone, and not to the barbarian Moors.** p.253/ When the Saracen invasion came the Romanized inhabitants fled, and like the Jews of old were spread over the face of the world; ... **the African churches were destroyed not because they were corrupt but because they failed to reach the hearts of the true natives of the Province.** p.254” 引文出自 Holme 書。北非教會情況近似景教在華欠缺植根基層，以致在逆境下無以為繼；「文革」卻打不倒中國教會，是因基督教早已植根廣大基層。

一回教徒和未知數量散居歐洲猶太教徒，餘下的歐洲信主人口是 2500-3000 萬（以量計稍多於亞非兩洲），但歐洲為數不少是第 1 至第 2 代信徒，對比亞洲大比數是長達 25-30 代信徒，以質計大為不同。誠然，以上只是從質、量宏觀地比較，難免粗疏，還是有待更深入的比較研究，才察知底蘊。然而，聖經所說「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歷久常「真」。

小結：盛極一時的「東方教會」，今天絕大部份是「回教世界」輝煌建築底下頹垣敗瓦。回教的神學，曾藉此辯證上帝定然是寵愛穆斯林，才能取代所佔領地區強大的基督教。回教這一式歷史自辯與自誇，對西方後基督教大國總不是味兒，近年西方世界回教人口（包括難民）急劇擴張，再展揮之不去的歷史陰影（如十字軍東征不成功之恥辱）；這可從今天西方的右翼民粹政治再度回潮、大得民心，赫見歷史的重複再現，迫近眼前。「911」以後現出伊斯蘭國(ISIS)針對基督教大國，惡化這兩大宗教的「對峙」；若兩方續被政治勢力牽著走、邁向武力終決，全過程正是考驗今後全球教會「真智慧」，能否從歷史中「重複教訓」領悟新的聖經詮釋、破解舊的神學執拗？